

AMERICAN NOTES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Eyes Of An International Visitor



侯且岸 章文 等◎著

美国纪行

国际访问者看美国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AMERICAN NOTES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Eyes Of An International Visitor

美国纪行

国际访问者看美国

侯且岸 章文 等◎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纪行 / 侯且岸等著. —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05-8069-8

I. ①美… II. ①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7380 号

本书的出版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与资助, 书中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与立场

出版人: 孙泽军
责任编辑: 宁伟
装帧设计: 揽胜视觉

策划: 李江南
特约编辑: 张宝婕
技术编辑: 张波

美国纪行: 国际访问者看美国

侯且岸 章文 等著 [侯且岸 骆兰兰 孙冀 王锋 杨晓 王勇 许贝宁 玉美英 张鑫焱
张耀杰 赵牧 王冲 王中美 张慎思 张鲜堂 艾合买提江·艾山
陈奕敏 邓聿文 胡永红 蔡友铭 邹平学 章文 周传斌 丁烨
马红 仁增措姆 田享华 余坦坦 张晓琳 张英 张泽慧 赵跃巍
俄木沙马 李洋 李仁波 刘晓原 雷霞 钱静 王为景 杨开湘 张志安
蔡剑 杜雁 李晓坤 唐隽菁 王鸿 余绍敏 张建杰 朱莺]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8069-8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调换:

北京广版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010-65542969

目 录

前言	i
IV 三题·侯且岸	1
访美见闻·骆兰兰	13
IV 与我的学术生活·孙冀	19
美国梦，中国心·王锋	23
盐湖城：IVLP 之旅中难忘的一站·杨晓	27
一段美好的回忆·王勇	34
美利坚的宪政剪影·许贝宁	38
说说美国·玉美英	44
探访美利坚：熟悉而陌生的国度·张鑫焱	49
我所感知的美国社会·张耀杰	54
走马美国：苏珊，我会想你的！·赵牧	60
警察没开过枪，狗也能当市长：美国社会的四个矛盾·王冲	64
访美脸谱记·王中美	69
“我的泪花和子弹一起在飞”·张慎思	73
现场感悟美国中期选举·张鲜堂	83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艾合买提江·艾山	93
伍斯特市的地方治理经验及启示·陈奕敏	97
美国社区自治与私人杂志·邓聿文	101
收获：我们的 IVLP 生活·胡永红 蔡友铭	107
美国社会的宪法意识与公民宪法教育·邹平学	113
“敌对”的“和谐”·章文	120
美国穆斯林掠影·周传斌	123

访美有感四则·丁烨	134
人生至宝：我的 IVLP 之行·马红	139
美国 NGO 领域一瞥·仁增措姆	14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追忆赴美之行·田享华	151
美国，N 个让我“想不到”·余坦坦	161
一个人的力量·张晓琳	170
访美散记·张英	174
在美国感悟友情与自由：访美散记两则·张泽慧	180
感受美国的融合教育·赵跃巍	186
美国并不遥远：我的访美记事·俄木沙马 (SHA MA E MU) ...	191
第蒙一夜·李洋	205
从新交流到心交流·李仁波	209
走进美国的监狱： 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见闻录·刘晓原	217
美国的 NGO·雷霞	225
访美纪行三则·钱静	229
美国环保印象·王为景	238
休斯敦之行札记·杨开湘	240
融合时代的变与不变：美国传媒业考察随感·张志安	245
多元化、友好、科学：记我的 IVLP 见闻·蔡剑	255
永久的记忆：美国行的九个片段·杜雁	260
访美随感录·李晓坤	267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对美国基础教育的考察·唐隽菁	282
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我的 IVLP 生活·王鸿	292
英健和她的美国·余绍敏	297
牧家掠影·张建杰	302
卓越与平等：我的 IVLP 生活·朱莺	308
后 记	315

IV 三题

侯且岸

侯且岸，现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 年国际访问者。

我是 1999 年 4 月参加 IV（International Visitor 国际访问者）项目的。至今，已经 13 年过去了，但这段使我终生难忘的特殊经历依然历历在目、回味无穷。为参与本次征文，我特地选取了反映与自己“IV”经历相关的重要短文合组成一文，定名为“IV 三题”，与学友们分享我多年的所得与所悟。

题一、特殊纪念

2001 年 9 月 26 日，在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半个月后，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在京 IV 学友的聚会。作为学友代表，我做了题为《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理解》的发言，阐发了对“9·11”事件的基本看法。在我看来，“恐怖主义者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是对全人类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他们必将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然，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我们也必须对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作出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思考。因为它是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的一部活生生的教材。我们没有理由回避”。今天，重温这段论述，仍有其特殊的意义。下面，我就把发言的全文附后，

作为题一之首。

尊敬的雷德大使，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为能受到雷德大使的邀请，与诸多美国使馆的朋友和中国的 IV 见面，感到十分荣幸。这也使我能够有机会与你们共叙对“国际访问者”项目的看法，以利于更好地推进这一项目的发展。

在发表我的看法之前，作为多年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美国人民的朋友，我想再次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并对不幸遇难的无辜者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恐怖主义者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是对全人类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他们必将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然，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我们也必须对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作出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思考。因为它是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的一部活生生的教材。我们没有理由回避。

作为 1999 年的 IV，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对这个项目始终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它所带给我的影响将是终生的。

就我个人的感受，“国际访问者”项目是有着深远意义的跨文化项目，是一项和平的事业，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的跨文化交流，加深我们对于异文化的了解，增进相互理解。我记得，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曾经说过，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相同的战略利益。相反，是要通过对文化差异的认同，接受这种差异。因此，我在访问中，很重视从跨文化层面深刻认识美国、美国文化以及中美文化的差异。回国以后，在继续从事美国“中国研究”的基础上，我在学院内广泛推广“通识教育”，开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跨文化研究课程，其中也包括“中美文化比较”。

就这个项目的内容而言，可以说因人而异。根据使馆项目官员的要求，我对参加本项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因而访问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主要是希望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美国高等学校中研究生的公共政策教学”。通过访问，我不仅达到了目的，而且还不断地生出新的创意，增添新的内容。例如，关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关于“NGO（G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与 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组织)”，关于“美国汉学史”(1830—2000)，关于“公共政策与美国政治”，等等。访问期间，我还写了几万字的日记和笔记，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从这个项目的效果来说，它所产生的影响的确是难以估量的。就我个人而言，它为我架起了一座理性和友谊的桥梁。在美期间，我访问了12座城市，参观了11所大学。我接触的社会范围广泛，应邀到7个美国家庭做客、居住。回国后，我同美国朋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还邀请他们来中国讲学、合作办学。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美国朋友到访。8月中旬，我的朋友——俄亥俄州鲍德温·华莱士学院的马克·沃森教授组织国际研究生专门来我院，与我们的研究生举行学术讨论、座谈。另外，我们同使馆的文化处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要特别感谢郭谨女士、周月女士，她们出色的组织工作，为我们的项目取得成功提供了基本的、可靠的保障。

最后，我想说，中美两国需要保持深入的文化交流，以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建立牢固的友谊。“国际访问者”项目作为一条纽带，将发挥更为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祝愿“国际访问者”项目取得更大的成功！谢谢诸位。

2009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我们在1月10日组织了在北京IVLP学友小型座谈会。为此，我撰写了一篇短文。这里，我将文章附后，作为题一的另一部分内容。

2001 纪事——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关系。在即将迎来两国建交30周年庆典之际，回首往事，我们需要超越既定的思维取向，深化对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重要历史环节的感悟。

中美建交的30年中，大约每10年左右，都会遭遇一次重大的事件，

强烈地冲击着原本脆弱而又紧紧依赖的中美关系，甚至于会重塑其发展方向。中美之间特殊的国家关系，自然会影响到每一位关注中美交往的中国公民，也必然会触发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寄予厚望的人进行理性的、深层的思考。

作为以美国中国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为主要领域的学人，我将回忆与反思的基点定位在2001。这一年，人类在憧憬未来中初入新的世纪，却很快蒙受了文明史上罕有的灾难。尽管一般人会把“9·11”看作美国人的噩耗，但在我的视野里，它所显现的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挑战。

就在2001年的春天，我受俄亥俄州鲍德温·华莱士学院之邀，为该院哲学系学生做了一次专题讲演，题目是：“认知文化差异”。为什么会想到给美国学生讲这样一个问题呢？那是因为两年前丰富的IV（International Visitor 国际访问者）经历使我领悟到费正清先生当年所言的深刻内涵。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减少分歧的关键主要并不在于寻找共同的战略利益，而是在于建立起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冷战”终结以后，在东西方间消除文化的误解，进行文化的重建的确是当务之急。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所凸显的主调即是：“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文化共存”，要“使文化在21世纪完成它最重要的功能：将和谐的方法带入我们的生活”。

在该学院哲学系的讲演引发了该院师生的广泛关注，商学院也专门邀我为MBA又上了一课。当我向院长问明缘由时，他的话颇使我一惊：我们的MBA是国际性的，他们必须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否则他们将无法从事国际商务活动。你要知道，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MBA的核心课程。吃惊之余，我首先联想到的是国内版的MBA。看来从美国得到的借鉴在这里着实打了折扣。

归国不到半年，便发生了“9·11”事件。回想起当时的中国，国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至今仍令人感慨，也使人困惑。那段时间，我正在给硕士生上“中西文化导论”课。对于涉世未深，且充满激情的莘莘学子，此时此刻特别需要培育理性的精神。他们需要学会“认知”，自觉地从人类

的一起来认识问题。这样才会免于盲动，从复杂的险象中厘清事件的本质。基于此，我们的课堂把整个事件看作一部鲜活的文化教科书。1个月后，在一次IV学友会议上，我重申了上述观点，引发了同仁的共鸣。

对我而言，2001年可谓文化年。临近岁末，我又应邀到武汉大学参加“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并且做了“文明冲突与文化差异”的主题发言。我特别谈到：文明冲突的加剧主要源于对文化差异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需要对文化差异在认知上进行深入的探究。论坛会场的气氛相当热烈，听众提出的问题颇显尖锐。记得有一位听众问道：既然你指出对文化差异要有理性容忍的态度，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美国文化的东西是什么？而美国人最不能容忍中国文化的东西又是什么？这真是一个庞杂难解之题。当时我的答复是：中美文化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对人性的本质和个性的自由具有根本相异的理念。在文化取向上存在着多元与一元、法治与人治的固有对立。这恐怕是中美两国文化的基本差异所在。差异本身就显现矛盾，它直接影响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样认知这种文化差异？怎样才能逐步地消除相互之间的文化分歧，解决文化矛盾？今天，这些问题是不是还在困扰着我们呢？！

题二、“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回顾我的IV经历，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在美国的著名高等学校深入了解“通识教育”。回国后，我努力将这种教育植入研究生教学之中。在我的专著《认知中国：文化研究的路径》一书中，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下面，我将该书“自序”中的有关部分附后，作为题二。

自从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到1999年出站以后，我的思想触点和学术兴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认知领域亦随之有所转移。特别是近几年，由于我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跨文化研究的实际需要，便越发关注有关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的研究，并且还

有意识地把这种研究同实施“通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加以展现、丰富和完善。应该说，本书就是这方面心得成果的集中体现。收入本书的文章大多已公开发表，主要的刊物有：《史学理论研究》《教学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新视野》《学习时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社会科学报》，等等。

细心、内行的读者也许会就此发问：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何来重要？它在整个文化研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它与你所倾力探究的跨文化理解问题是什么关系？它和思想史研究又有何种姻缘？等等。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回忆我同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一次重要会面，正是那次使我获益匪浅、终生难忘的见面直接激励着我开始着手进行上述特殊的文化理论探索。那是1999年的春天，由于我在对美国汉学研究方面所有的初步建树，有幸得到了美国新闻总署（该机构现已裁撤）的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项目，对美国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考察。对这次考察，中间的每一段具体行程，我们双方都进行了十分周密的准备，计划可谓异常精细，细化到所会见的每一位学者的访谈时间和基本内容，真正使我从中领略到了对方的高效和严谨。

作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威斯康星大学是我的首选之地。在那里，我特别想见识两位资深望重的学者：一位是周策纵先生，另一位是莫里斯·迈斯纳先生。但不巧的是，后者到英国去了。我和周先生的会面如期进行。

周策纵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红学研究享誉美国学术界，一直是我崇敬的长者。他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思维依旧深邃、敏捷。因此，我特别想从他那里了解他对美国汉学界的真实看法，聆听他的教诲。我把访谈的主题很快切入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但周先生在明白了我的意图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主题，而是把话题转向了思维认知领域。他对我说：“我们做学问，首先需要厘清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否则，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几乎无法开口讲话。”他还给我

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原因：“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是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 to be 或 being 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意识，发展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美国 50 年来的切身感受，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说实话，对周先生的这番话，我当时的感悟并不够深透。回国后，对照他的有关文章反复阅读、反复体味，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所在：周先生是在引导我分辨中国学术一直难于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同时他也要告诉我，如果对美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思维、范式和概念都没有基本了解的话，又如何对他们的中国研究进行研究呢？！这的确是我从事美国“中国研究”以来所遇到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新的挑战。在周先生的激励之下，我开始越发重视对学术思维的思考，进而深入到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的对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从中导引出了本书。所以，在这篇序言中，我要向周策纵先生特别表达内心的敬仰、感激和喜悦，并祝他健康长寿！

确实，学术思维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学者重视、关心、思考的基本学术问题，尤其是对取向和概念的认知，对语境的认识，更是不容忽视。虽然国内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也注意到，已陆续有涉及这方面研究的译著出版。比如，英国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英国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英国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等等。我相信，随着中西文化

交流的不断深化，一定还会有更有分量的中文著作问世。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从学源上看，本书所涵盖的内容是我的美国汉学研究的副产品，但它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又都大大超出了汉学研究本身，因为它所要试图揭示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领域（往往被人们在既定的思维下回避，也可以说是“不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作用亦在于唤醒、启蒙。当然，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的特殊性，自然会引起争议，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我在讲授有关内容时，就已经遇到过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出现比较激烈的争论。我真诚希望得到读者理性而公允的批评。

这里，我还想告诉读者的是：通过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的研究，使我迫切希望打开它与思想史研究的“通途”，将文化思维问题、思想训练问题引入思想史研究，开辟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而在现实的中国，我们特别需要认真思考的就是关于近代科学思维观念的形成和建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本书当中已有所阐发。可以说，这种深层的思想分析是本书所独具的学术特色之一。

谈到本书的酝酿和写作，还应当向读者介绍的就是“通识教育”的问题。对于中国内地人来说，“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许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但在西方国家，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这确是一个颇为流行的概念。在那里，凡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必须接受“通识教育”。从总体上说，“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提供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背景，提供深入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取向和方法，提供必要的学术规范，从而全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显而易见，“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种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它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基本特点，符合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目前，国内教育界非常关注素质教育问题。据我了解，素质教育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参见阿正编著《世纪对话——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因为这一概念既不确定，又无法形成自身系统的理论。再者，任何教育都包含着改善人的素质的内容，强调素质教育，恐怕只是一个针对改革应试教育

弊端而提出的政策性口号，并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概念。因此，我以为：无论是从规范概念的角度，还是从丰富教育内容、教育理论出发，用“通识教育”（可以允许有不同层次的“通识教育”）来取代素质教育不失为一个消除争议、获取共识的理想做法。当然，这种取代的前提，应该是教育界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必要性要有准确的理解。

在实施“通识教育”方面，国外和我国香港的经验固然确有其效用，但要使它们的经验对我国的**教育真正发挥效应，恐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紧密结合自身的特点，去努力探索，认真加以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2001年开始，我利用自己多年从事跨文化研究的经验，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学术思考，初步整理出一套有关“通识教育”的方案，并且以“人文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西文化导论”为题，在北京行政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班、在职研究生班（公共政策专业、工商管理专业）试讲，其中的部分内容在其他班次专业的有关课程中亦有所涉及。最近两年，我又在进一步扩充、深化有关内容的基础上，给我的博士生和校外博士生讲授，引起研究生的极大兴趣，反响十分强烈。这样的效果，使我更加坚定了继续深化这项开创性教学的信心，激励着我去进行新的探索。

概括地说，我的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按照讲课的顺序排列）：“通识教育”概述，“思想训练”，跨学科研究论析（主要以地区研究为个案），后现代主义理论，学术研究中的概念与术语（紧密结合对外来文化中的学术概念术语的翻译和理解），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与文化哲学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关于人的现代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尤其关注民主理念的研究），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思想史研究为主），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美国的中国研究为个案），若干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每一个单元都要介绍一定数量的参考书（包括经典著作、学术专著和工具书），整个课程大约需要80学时。

现在，与上述教学内容有关的文章和部分讲义亦一并收入本书，成为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可以作为对研究生进

行“通识教育”和“学术思想训练”的参考教材。

题三、多元文化

我所推动的“通识教育”特别讲求对学生进行多元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培养。参加 IV 项目，深化了我对多元文化的认知。这里，联系我的具体教学实践，谈谈自己对多元文化的现实关怀及其思考，权为题三。

我给博士、硕士研究生上课，专门分析文化的多元性问题，并由此引出文化差异理论。我告诉学生：“通识教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讲多元文化。离开多元文化，我们的知识就是残缺不全的；同样，离开多元文化，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也难于达到应有的深刻。

为了检验学生对文化的认知深度，以及对文化的现实关怀程度，我曾向学生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在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什么？其二，比较中美两国文化，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关于第一个问题，学生给出了 8 种答案：1. 如何正确地理解宗教和宗教的作用？2. 关于文化的包容性问题。3.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4. 思维与认知方式的转变。5. 反对文化霸权，建立文化的平等观。6. 摒弃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理解对方。7. 明确文化概念的规定性。8. 在理解文化问题时，剔除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充分肯定了学生的思考和提出问题的品质，并且对每一个答案都做了评析。的确，每一个答案都有其合理性，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体现了学生们对文化的现实关怀，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但是，这些答案还都不足以说明乃至抽象为我所提出的“最值得重视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最理想的、准确的答案呢？在我看来，就是“关于文化的差异与独特性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的问题。其实，它确是一个被人们所忽略，并且充斥误读的难题，需要我们给予重新的认识。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层次。一般而言，对于中西文化（包括文明）之间表现出的差异，人们根据各自的境况都能够有所感

悟，只不过是存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区别罢了。然而，从研究的初衷来说，我并不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欠缺而提出问题的。我是试图提出一条新的认识理路：思考差异的内涵和性质，进而认同、容忍和容纳差异。运用这样的认知理念，去揭示更为深层的问题。可见，相对于学生所给出的答案，我的认识理路更为基本，更具涵盖力。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将认识的视角转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回顾时人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讨论，以引发新的思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感到，在文化、文明问题（恐怕也不仅仅是这些问题）上的思索，历史上的认识远比今日的认识深邃，而且也少了很多功利因素。

我援引了冯友兰与印度文豪泰戈尔的一段谈话作为导语，这段谈话主要涉及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认知，以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性质，并且联系到中体西用的传统思维方式，很富启发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泰戈尔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并不是“等级差异”，而是“种类差异”。因此，两者是平等的，是“真理的两个方面”，可以互补。冯友兰则强调说，泰戈尔的东西文明观是“一元论”，他把文明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如同中国传统旧说，对文明作“二元论”的揭示（实际上，这里已经包含有文明的不平等因素，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

泰戈尔和冯友兰的看法，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文化、文明的平等观，因为“种类差异”是一种平等的差异。这样，就摈弃了某些人为的价值判断标准，为我们建立了认同、容忍和容纳差异的基本前提。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认识。

关于第二个问题，学生提出了4种答案：1. 对个体与社会（确切地说，应该是集体）的认识。2. 对个性自由的认识。3. 对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认识。4. 对人的价值观的认识。

我认为，学生基本上抓住了中美两国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达到了一定的认知深度。但从问题的要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与此相联系的诸多思路还有待于发现。再有，中美两国间的文化、社会差异极大，

反差异明显。如何给予明确的界定，绝非易事。

我从自己多年的跨文化研究实践感受出发，觉得需要跳出意识形态，摆脱利益关系（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这样的说法：由于中美两国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我们之间可以消除分歧，达到相互理解。我认为，这是政治话语，绝不能套用过来，用以理解文化关系。正如费正清所言：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两种力量的结合，而是两种文化的理解），才能比较冷静地认识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基于这种认识，我将中美文化的根本差异概括为这样几点：中美文化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对人性的本质（特指善与恶）和个性的自由具有根本相异的理念，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在文化取向上存在着多元化与一元化的固有矛盾，在国家机制上则又充分体现出法治与人治对立。这些，恐怕是中美两国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差异本身就是矛盾，它直接影响到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大难题）是：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这种文化差异？怎样从差异中寻找相似性？怎样才能逐步地消除相互之间的文化分歧，解决相互之间的文化矛盾？

写到此，我想以著名美籍华裔教授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语。余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下了这样的结论：“今天世界各民族、各文化接触与沟通之频繁与密切已达到空前的程度。面对着种种共同的危机，也许全人类将来真会创造出一种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价值体系。中国的‘大同’梦想未必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中国人还必须继续发掘自己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期望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创生过程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贡献。”